



Amélie Nothomb

幸福的怀念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段慧敏 译

*La nostalgie
heureus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幸福的 怀 念

〔比利时〕阿梅丽·诺冬 著

段慧敏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怀念 / (比) 诺冬 (Nothomb, A.) 著; 段慧
敏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 - 7 - 305 - 14878 - 1

I. ①幸… II. ①诺… ②段…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198 号

© Editions Albin Michel - Paris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15 - 005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幸福的怀念
著者 (比利时)阿梅丽·诺冬
译者 段慧敏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60 千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878 - 1
定价 2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将成为杜撰的故事。我最初的杜撰之一是日本。五岁那年，自人们将我从日本带走开始，我便已经开始为自己编织这故事。很快，我叙事之中的缺漏使我感到不安。我曾经以为了解这个国度，但多年来它已与我身心远离。关于它，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我从未想过要去杜撰。它是自然而然开始的。这里没有鱼目混珠，也没有刻意粉饰。人们的经历会在心中留下一种曲调——这正是人们在叙述中执意聆听的东西。重要的是用语言的方式将这种声音描述出来。这便意味着会有切分和近似处理。我们的删减恰恰暴露出了我们内心的纷乱。

我需要与伦理再次取得联系。他是我二十几岁时弃之远去的未婚夫。我一时找不到任何他的联系方式，这似乎并不是疏忽所致。因此我从巴黎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国际信息问讯处。

“您好。我想找一个东京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只知道对方的姓名。”

“您请讲。”那人回答道。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我的问题的荒谬——东京都有两千六百万人口。

“姓氏是水野，名字是伦理。”

我拼读给对方，那是艰难的一刻，因为我从没记住惯用解释法，而说了一些类似于“什锦水果的水，骑

士小说中的野马的野”之类，我能感觉到电话另一端的人对我的憎意。

“请您稍候，我为您查询。”

我等待着。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伦理是我认识的最温柔的男孩子，可能在四十秒后，我就可以再次和他通话。

“东京没有人叫这个名字。”那人继续说道。

“什么？您是说没有水野伦理这个人？”

“没有。东京没有人姓水野。”

他没有意识到，但这就像是说在巴黎没有人姓杜朗。“伦理”是一个很少见的名字，就像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人叫做“阿塔纳斯”一样，这或许是为了弥补姓氏平凡的缺憾。

“我应该怎么办？”

“等等，我找到了一个号码，我想是日本的问讯处。”

他给我报出了十四个数字。我谢过他，挂断电话，又拨通了日本问讯处的号码。

“Moshi moshi”，我听到一个非常动听的女性

声音。

我已经有十六年没有讲过这种奇妙的语言了。不过,我成功地询问了她是否能够帮我找到水野伦理的号码。带着第一次读到一个罕见词的人所会表现出的礼貌的好奇,她大声地重复了这个名字,而后请我稍候。

“没有水野伦理这个人。”她最终告知我。

“但是有人姓水野?”我坚持道。

“没有。非常遗憾。”

“东京没有人姓水野么?”我惊呼一声。

“在东京是有的,但是在您所拨打的高松公司,其号码簿里没有。”

“请您见谅。”

此后会多出这样一个宇宙奥秘:告诉我日本国内问讯处号码的法国国际问讯处员工,为什么会将我推给鲜为人知的高松公司的号码查询处?不过这家公司的总机话务员非常可爱。

我重新打给法国国际问讯处,接电话的是另一个人。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绝妙的主意:

“打扰您了，我想要东京的比利时大使馆的电话。”

“请稍候。”

他把我转到等候音乐上，这音乐声非常微弱，以至于它不会使人气恼，反而能够唤起同情之心。

十分钟之后，我的思想快接近虚无的时候，那人又在电话里对我说：

“没有这个地方。”

“您说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在说什么。

“东京没有比利时大使馆。”他言之凿凿地对我说。

他或许会用同样的音调对我说在摩纳哥没有阿塞拜疆领事馆。我觉得毫无必要对他说我父亲曾经在东京的比利时使馆工作过很长时间，而且这并不是非常久远的事情。我谢过他，挂断了电话。

本可以简单行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呢？我打了电话给我的父亲，他背出了东京比利时大使馆的号码。

我拨了这个号码，要求和伊达小姐通话。我想她现在应该是五十岁左右了。我们首先互相寒暄了几句。伊达小姐是日本驻比利时前任大使的女儿，有一点像是我的对应人物。我最终问出了我的问题：

“伊达小姐，您是否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年轻人，我当时那个未婚夫？”

“记得，”她带着揶揄的语调，似乎暗示着我的此等不端行为肯定不会被忘记。

“使馆的档案中会不会有关于他的联系方式的线索？”

“等一下，我来查询。”

我很感激她没有嘲笑我彻底丢掉了他的联系方式。五分钟之后，伊达小姐说：

“他已经不在使馆的档案里。但是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一所珠宝学校的校长，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家学校。您的……您的朋友现在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这是这所学校的号码。”

我兴奋地感谢了她，然后挂断电话。现在，我需要勇气。我决定毫不犹豫立刻打给他。

一位总机话务员接了电话。我要求和水野伦理通话。她礼貌地拒绝了我，好像我是在要求和英国女王通话一样。

“我是从巴黎打来的。”我语无伦次地说。

她怜悯地叹了口气，问我可以通报的名字。

“阿梅丽，”我说。

在水野学校，我曾是《四季》协奏曲的同义词，七十年代的日本，人们将这个曲目看做是代表蜜月旅行的曲目。

五分钟之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电话的另一端响起。

“简直不可能，”伦理以无懈可击的法语说道。

“听见你的声音真开心！”我傻乎乎地喊道。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们已经有十六年毫无联络。伦理是我二十三年前遇到的那个极为善良的男孩子，我对他的感情从未改变：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而是一种如果没有经历过便不会感受到的亲密的兄妹之情。

“你过得好吗？”他兴奋地问我。

“很好，你呢？”

从未有过的愉快的寒暄。我发现自己曾害怕他的反应：五年前，我出版了《非亚当非夏娃》，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我们的关系。当然，故事中呈现了当时的他，一个极好的男孩子。但是他或许同样会怨恨我。“或许他并不知道，”我这么想着——这是典型的我，当我发觉某个人并不怨恨我，我便会立刻想象出某些借口，我的负罪感是那么的深重。

我相信伦理猜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说：

“我读了你所有的书！”

“真的么？”

“是的。我还在 YouTube 上看了你所有的电视访问！”

他作出肯定回答的时候，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劲头，这表明了他的观点。很显然， he 觉得我的书和我的电视访问滑稽可笑。唉！我很会应付。和我的父母一样，伦理属于那种人，我一开始说话他们就发笑。我从未理解过这种态度，但它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伦理，我三月末要回东京。我们可以见个面么？”

“非常乐意。”

“我太高兴了！”

“你的号码没有显示，你能告诉我么？”

我告诉他我的号码，并请他常常打给我。

“我想紧紧地拥抱你。”

“我也是。”

我挂断电话，深受感动。我从未料到这样顺利。

我乘势给西尾太太打了电话。她是我的保姆，我非常喜欢她。阪神地震第二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通过话，已经有十七年了。打电话给她对我来说更为容易，她曾是我的乳母，在我们之间从不存在有争议的情况。当然，她除了日语什么语言也不会讲，而我已经十六年没有讲过日语，但我不是也同样自如地应对了高松公司那位可爱的女孩和水野学校的接线员小姐么？

我鼓起勇气，拨了西尾太太的号码。儿时的我曾像喜欢妈妈一样喜欢着她。拨日本的电话号码时，连

铃声都是不同的，我正思考着这一现象，一个年轻而活泼的声音打断了我：

“请问是西尾太太么？”

“是的。”

这应该是她的某个女儿。不可能是我的乳母，她已经七十九岁了。为了保险起见，我继续问道：

“您是京子么？”

“是的，我就是。”

难以置信。她依然保有我四岁那年她对我说话时的声音。我想告诉她这一点，但是我的语言方式使我很难表达。

您的声音……难以置信！我像一个傻瓜一样重复着。

“您是哪位？”西尾太太迷惑不解地问道。

“我是阿梅丽酱，”我答道。

我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就这样叫我，意为“小阿梅丽”。

“阿梅丽酱！”她的语调中带着同样的怜惜，就好像我确实是四岁一样。

“您记得我么?”

“当然!”

我眼含泪水，表达越发困难。

“阿梅丽酱，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在巴黎。”

“什么?”

“巴黎，法国的巴黎。”

“你在那儿做什么?”她问道，就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可理解的蠢事。

我听见自己答出这样一句令人不快的话：

“我成为了著名的作家。”

“啊，是吗。”西尾太太说，语调听上去好像是觉得我在随便说些什么。

“西尾太太，您愿意和我一起为电视台录制节目吗?”

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想问她的问题。但是我的表达胡乱拼凑，以至于她答道：

“你想和我一起看电视? 可以。我有一台电视机，你可以过来。”

“是的。不是。”我的日语忘记得太多了。“法国记者想见您。您愿意么?”

“你也会在么?”

“是的。”

“我很乐意。你什么时候来?”

“三月末。”

“好的。你父母都好吗?”

她跟我说话，就像是跟一个温柔的精神病人说话，这个精神病人自认为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却连一个正确的句子都说不出来。

我挂断电话，以手掩面。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和我的父母共进晚餐。我原本想和他们谈起我即将启程的日本之行，以及之前打过的两次电话。正要说起的时候，我却无从开口。

这是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特别是和亲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吐露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时，叙述机制便停止运转。这不是生理的原因，我依然可以发出声音。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我被这样

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我便缄口不言。

而我的姐姐也在那里。我喜欢和她说话。但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着在动身去日本之前还会和他们一起吃晚餐，并以此来自我安慰。那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自 1996 年 12 月以来我便没有再踏足日出之国。此时是 2012 年 2 月。出发的日期定在 3 月 27 日。没有日本的十六年。我的五岁到二十一岁之间也是同样的时间跨度，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就像是穿越了一次沙漠。五六岁的时候，为了平静地忍受，我会藏在桌子下面。在这个幽暗的角落，我重建起我的花园，我的伊甸园之曲，回忆因此变得比现实更加真实。看到这个由幻影重现出的已失去的世界，我会睁着眼睛哭泣。人们找到我的时候，问我这是何种悲伤，我答道：“是怀念。”

很久以后，我发现在西方世界“怀念”是被人轻视